



社会根理论

知识行动论研究

第一卷 社会根论

郭强 著

Theory on the Social Root
The Theory of the Action and Knowledge

社会根理论

知识行动论研究

第一卷 社会根论

郭强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根理论: 知识行动论研究. 第一卷 / 郭强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495 - 2619 - 2

I. ①社… II. ①郭… III. ①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5419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划编辑: 杨志友

责任编辑: 刘冬雪

装帧设计: 蓝 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景盛南四街 15 号 邮政编码: 101102)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36.25

字数: 540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前言：我的不完全交代

如果说，社会根理论或者知识行动论成立的话，那么这还是刚刚起步的事情。就这部《社会根理论：知识行动论研究》来说还没有完成，即便是所给出的这三卷也还没有写完。知识行动论在路上。

从我的角度讲，这部著作包括的内容应是很广泛的。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根的思想或者知识行动论思想还需要更多的挖掘和整理。我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思想深深影响着我，对无根的现代人来说，不说找到能够依据现实写出几十卷著作的人，就是找到能够认真读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人，也很是困难。这不仅印证了社会无根的说法，同时也越发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尽管这三卷著作中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观点并不是太多，但是我把这种敬仰当作写作的指导思想留在了写作和思考的背景之中了。很显然，在以后的写作中，马克思出现的次数将更多。二是，中国思想，特别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根理论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的缺失将使这种知识变得轻飘，甚至转变为无根化。这部著作还没有来得及把根扎向这块沃土。我深信，只有在更广阔的根域中一个社会或者一种知识才能更好地生长。接续传统是社会根理论的基本宣称，去传统是断根的表现，任何忽视或者丢弃传统的知识，都无法绵延自己的生存。作为生存的知识、作为存在的知识、作为行动的知识在中国早期思想的沃土中都已经生根成长。在以后的写作中这部分内容不仅有专门的吸收式讨论，而且会转化为一种原则性的思想在整个写作中被坚持下来。三是，帕森斯、哈贝马斯、布迪

厄、鲁曼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关于社会的理论将在以后的写作中专门出场,因为这对我们判定社会的无根特性和社会扎根的知识行动都提供了更加广泛的根域。所以,在以后的写作中似乎出场的人物都能够在社会根域的土台上演绎出更为精彩的景致,因此可能还是值得期待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不仅历史深度的泛起性昭示没有出场,即便全三卷内容也留下了许多需要讨论的重大问题或者需要扩充的重要内容。这里呈现的仅仅是一种用读书笔记填充的思想框架,更多的则留给了读者和我们共在的这个时代。让我们用深沉而又愉悦的思考,让我们用有力而又轻盈的行动来为我们共在的这个社会植根吧!

一、我们都在社会实验室中观察：庆幸我们所在的时代

我们处在大时代,这个时代是大变革时代、大转型时代,也可能是大分裂时代。第一,我们处在一个大时代,应该庆幸我们所处的时代。尽管在书中介绍和讨论了对我们所经历时代的不同说法,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处在社会的实验室之中。我们经历和感受着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饱览春色无边,历经世事剧变的阵痛,目睹英雄与枭雄的挣扎;感受风起云涌的变幻,体验激越而丰富的生活;膨胀着理想的豪情,奋战在激流险滩的漩涡。在这些细节的背后是大时代的大转型,从传统到现代的现代性迈进,从现代(工业时代)到后现代(后工业时代)的转变等。非常感激这个大转型的大时代,让我们遭遇了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体验元素。这样丰富的经历是祖先们从来没有过的。前人几辈子都没有今人一辈子经历的东西多,这是时代给我们的馈赠。这个年代需要能贯穿古今、打通学理与事理的人来问诊和把脉,需要历经变革的人对变革记录、思考与粗加工,为后世留存史料。无论是否成为大师或者不成为什么,无论会遭遇到何种挑战,我都试图对我们所处时代进行思考,尽管依然还是行色匆匆、囫囵吞枣,难以推敲和咀嚼。伴随着这个社会的转型而产生的大时代,在社会根的冥想中记载了被激情燃烧的岁月和过渡者的涉水心绪。“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

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1995c: 33)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1995a: 203)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正是问题之于时代的重要意义。第二,大时代一定需要大叙事吗?这是由大时代所牵出的联想。先说叙事的大小。我深信,社会根理论不属于大叙事范畴,但是同样也是不属于小叙事范围的,甚至不是后现代主义思想下的那种叙事。我的观点是:我们生活的当下社会是大小通吃的,有大叙事也有小叙事。但是我更倾向于小叙事,中国有句古话叫“以小见大”,我想从最小的地方开始,从最底边的地方开始,所以把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通行动者视为社会根理论的原始起点。问题是所涉及的主题无法在小的圈子里游荡,只能是大时代大转型的大主题。“如果社会学还不关注它的大问题,那么,社会学的确会变得越来越沉闷,而且很可能瓦解。”(吉登斯,2003: 7)吉登斯的这句话给我们很多的警醒。所以有大叙事的嫌疑,甚至看不到小叙事的影子。或许,通过远离现实的方式接近现实,在无人的地方呈现人的存在也是一种方式。因此,某种意义上这是同大叙事没有多大关系的一种知识追求。大时代的小人物、大转型的小变化更是社会青睐的话题,但是只是作为影子在这种知识领域中晃荡,真正的出场将在下一幕。所以作为元理论的论述,这三卷内容只是吊胃口之作。再说帕森斯。社会根理论的设想,使我常常想起帕森斯。帕森斯时代的变迁在美国只是单线型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敲响了新时代的钟声。而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是单线型的大转型,而是复合化的大转型,特别在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既具有传统社会转型的全部特征,也有发达国家转型的所有特征;我们既有本国特色的转型,也有新世界体系到来的全球转型。这一切都叠加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变迁过程中。帕森斯时代需要大理论,我们现在所处的即大时代大转型同样更加需要大理论。很不幸,帕森斯成为靶子。两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文明的一个危机时期,社会失序,人心动荡,欧洲各国的学术大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社会也没有形成适合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发展的良好制度和光明前景,学术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相对孤立而安详的美国本土。社会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知识体系,更是在美国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知识的大转折是同社会的大转折密切关联的,帕森斯宏大理论出现之时就是后工业社会来临的黎明时

刻。这时候,青年帕森斯雄心勃勃,试图通过发展普适的宏大图式,综合并改进欧洲的经典社会学唯意志论与纯强制论分离的传统,建立“后经典”社会学。1937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力作《社会行动的结构》,创建了作为结构功能体系的社会“模型”;1951年又出版了两部理论巨著《价值、动机和行动系统》、《社会系统》,完善了其“宏大叙事”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此后,在战后西方社会政治稳定、自由民主意识形态高度繁荣的时期,信心膨胀的美国理论家们共同描绘了帕森斯的学术神话。但是几乎一致认为:帕森斯宏大理论本身隐藏着深刻的结构性弊端。他是想在理论中整合唯物论与唯心论、理性观与非理性观,主张社会行动的多维结构因素,但在实际论述中往往又片面注重主观的规范因素;他想整合社会秩序的个体论与集体论、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后期又片面强调个人唯意志因素。此外,他的理论过于宏观与抽象,远离了微观层面和经验视野,对不少暗自反思的学者来说,其实是一门“屠龙术”——大而无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屋宇”一间间坍塌,“后帕森斯”或“反帕森斯”的理论家们一个个崛起。在20世纪60—80年代的“后帕森斯”理论发展时期,我们经常看到随着一个又一个新理论家的崛起,一个又一个的帕森斯,成为各种社会学论著开篇中理论回顾的标准靶子——以供批判。为什么理论大师一晃就沦为学术靶子了?我的最基本看法是:这在于帕森斯的理论本身,但是又不全在此,而是在于时代的变化。也就是说时代注定了帕森斯被否定,或者说不是后来的理论家否定了帕森斯,而是时代否定了帕森斯,同时这种否定仅仅是除去非时代化的内容,而实质性的知识内涵依然具有学术史之外的启发意义。我随后将加以说明。说时代否定了帕森斯的某些观点,在于帕森斯的理论产生于新时代的前夜,而非在新时代大转折的过程中或者转折后。当时美国的情景一边是扎根性表现,而另一边则兴起了拔根性行动。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环境又发生了变化,南北矛盾、种族冲突、民权运动、左翼思想等此起彼伏,这些都成为新时代的动力,同潜伏在工业社会中后工业社会的新的行动体系共同营造了一个新时代的背景。帕森斯以美国为“样板”的“良性”社会模型变成明日黄花,他的理论中的各种弊端被学术思想的革新激荡潮流冲刷了出来。顺便提出一个问题加以思索:那些诠释现代和谐思想的所谓理论家们难道不需要,难道不能从帕森斯的和谐体系中获得启发吗?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提出帕森斯理论宏大而抽象进而否定这种理论则正好证实了这个理论而非否定。太宏大和太抽象的说法恰好说明帕森斯的理论成就太大了,就像一座大山,实

在无法绕道而过,只能从中找准薄弱点开道前进,偏偏帕森斯理论中的薄弱点甚至自相矛盾之处又确实不少——这几乎是所有理论的特点。不过,这些开出狭隘山道的反帕森斯理论家,往往也难以避免帕森斯理论中先天隐藏着的“理论困境”,在解释好一端的同时,为了避开另一端的混淆,只好在自家的理论中添加“剩余范畴”缝缝补补,聊以进行表面上的自圆其说。^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赞美帕森斯是否肯定自己呢?用社会根的观点,我的解释是:其一,帕森斯是护根之作;其二,社会根理论不仅要护根,而且还要拔根与扎根,包括寻根。维护帕森斯也是维护社会的知识之根,文化的绵延就是知识之根和社会之根的表现,我们如果连根都拔了,何来社会理论的发展?关于护根之思,我要说,大转型造就大时代,大时代需要大理论。但是仍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社会根理论——知识行动论是否是大理论?中国18世纪的思想大师袁枚曾经说过:“学问之道,当识其大者。”所谓“大者”,并非单指现代性视域中的那种宏大叙事之“大学”,尽管这种“大学”探索社会变迁和社会转折的规律与历程,但是现实的学问途径要求我们既要从细纹观察或者从细微着手深入思考和研究社会生活中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也要求我们直面社会的宏大问题与宏大叙事,这时大学皆为“大者”。从研究的对象上和研究的学科性质上以及要回答的问题上应该把这个理论归结为大理论。把社会的特性或者社会的本质属性作为研究对象,就社会根理论的学科属性来说既不属于哲学(甚至不包括社会哲学),也不单纯是社会学的研究,应该看作处在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种知识形态。如果说社会根理论是个大理论的话,那么这个大理论可能有两个前景。第一个前景带来的问题是:是否早了?照我看来,帕森斯的理论是大时代所需要的,但是在时代到来之前这个理论就出现了。所以作为早产儿,它尽管没有夭折,但是最终也没有长寿。那么,应该可以肯定,社会根理论作为大理论的一种不是早产儿,但也不是顺产儿。说不是早产儿就在于,我们正好生活在这个大转折时期,我们正在经历这个大转折,或者说我们正好生存在大时代到来之时,我们用身体体验这个过程,我们用心灵感受这个转折,我们用身心记录这些变化。如果等到大转折完成,大时代定型,回应这个转折和定型的理论可能更客观一些,更理性一些。但是那种实时性就逝去了。说是难产

① 这是网友 Chinabard 在2004年7月15日在《从理论大师到学术靶子——帕森斯传奇》网文中提出的说法。参见 <http://blog.tianya.cn/blogger/view-blog.asp?BlogName=Chinabard&categoryID=>

儿,原因在于:就大转折过程中某个问题的具象分析好像具有生动性,但是抽象性或者持久的解释力受到影响,而就宏大问题加以说明即对整个社会的大转折和大时代来临作出整体上的回应就凸显抽象性而降低了生动性和纪实性,所以比较难产。现在似乎露出了头,让我们期待吧!第二个前景带来的问题是:同帕森斯有点相似吗?作者没有期望于此,因为帕森斯理论不管怎样被时代否定,但是这个理论还是体现现代性特征的书写,是被众多的读者阅读的。而社会根理论的期待最多体现后现代主义的路数:只要生存了,哪怕昙花一现,哪怕众人皆唾,理想还是真实的,知识上的一种风格、一种气派、一种特色都浸入到中国大转型(折)的宏大行动过程中了。伟大的行动实践需要宏大的知识回应,这种大国气派、风格与特色滋生了无畏的胆量和想象的无限时空。我相信,帕森斯的截断众流的综合气势同美国当时的情形有着鲜明的一致性。即便是帕森斯理论的衰落也同样精彩,兴也何其盛,衰也何其忽!在社会根理论身上体现的这种理想也是显在的,当然遭受的批判也可能很猛烈。好在我早就做好了准备。第二个问题是:大理论作为社会理论,是谁的理论?这个问题是必须加以厘清的,无论在正文中是否获得了更加明晰的说明。当帕森斯的大理论直接是为资产者的时候,也就注定了或者内含了衰败的结局。我清楚地知道:社会底层是社会扎根的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常人甚至穷人都承担了社会扎根的最为基础的劳作。社会根理论是日常生活领域中最普通的行动者的理论,因为这是这个知识的表现形式和这个知识的一个起点。从普通人(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通行动者)出发回到普通人(甚至是穷人)是社会根的逻辑。不反对精英但更关注常人,是社会根理论的基本党性,也是长存之基。这种理论的党性,社会大转型时期似乎也必须坚守。常人逻辑是社会逻辑,也是社会根逻辑。我认为,这才是大时代的要求和大转型的内涵。所以这个声称也就底气十足。

二、社会根理论的设想与提出是胆大妄为吗

大转型的大时代的知识回应是知识人都明白的社会诉求。可以肯定地说,当下的许多知识人都在以各种形式对大转型大时代做出理论回应。但是大理论的大回应则需要气派。问题是这个底气来自何处呢?学识、敏感和想象力都

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这个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所蕴含的那种气派、那种胜景、那种美妙。我崇尚“中国化”概念和这个概念背后的理念。“中国化”也是世界化,这种说辞不是抽象的话语,也不是象征性的叫嚣,还不是学术史意义上的脉络梳理,更不是新民族主义的虚妄,而是在世界转折的背景下理论与实践的现实途径和实现方式与知识表达。这不是一种自我压缩的规定,也不是一种殖民他者的思路,而是更多地展示了勇气存在的方式。对世界大变革及全球大转型的知识形态的中国化回应,就是这种大变革和大转型本身,因为中国融合了世界。这种超脱民族本身的壮举,将融进世界的大变革进程,似乎正在表明一种引领性存在。大变革、大转折的大实践的大气行动为对这个时代做出中国化的知识回应垫足了底气。可能会有这种发问:那么多的优秀学者,那么多的国宝级专家,那么多的高人……你算老几?如果要回答,是无法排列的。但要问我是否有胆,我的回答则是非常肯定的。这种胆量源自于中国大变革的实践气派。这种气派可能表现在中国社会主义或者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行动,涉及每个人的大行动,这是社会大变革和社会大转折的根本所在。在这里要声明的是,作为一个学者,我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而非迎合。我可以极端地说: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的对应词,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卷入全球的社会大变革与社会大转型,就没有社会的大转折与大事件,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是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的不可或缺的根据。没有这种对应,世界不会成为目前的这种样子,世界在社会主义的知识行动中得以转换。只要是世界性的,必然含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和行动方式,任何超越社会主义而讨论当下社会或者形成一种大社会的理论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丰富人类知识体系,离开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只能是一种“假设的完美”和一种“超历史的理想”。(《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2008)这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赞歌,而是一种壮大的思路。中国社会主义抑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体现了某种高贵和优雅,彰显了某种大气和品格,趋向理性的成熟的和稳健的行动姿态,也日益附着在对世界探索的知识属性上。所以,这种大胆源于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提供的依据。但是对这种实践能否做出具有时代性的知识回应,恐怕在于回应者面对现实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能否达到时代对这种知识的要求和期望,理论建构能否达到实践所开辟的历史深度、实际水平和思想领域。这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深度实践对学者社会责任的提问和基本使命的要求。我很清楚,我无法满足。问题还在于: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

学者总得做些什么。我们都是这场大变革、这场大行动的当事人,我们都融进了作为实践过程的这种重叠的事件之中(这是一种过程哲学的思维)。作为历史的当事者,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张力和希望的时代。这种张力随处可见,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美妙前景组成了一副心酸又畅快的复杂情境。马克思说:“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1995a: 775)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对抗在当下的实践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夸张,那种黑暗的背景被牢牢地钉在我们希望的路途上。关于这种时代性的张力在本书的很多地方都有触目惊心的描述,但是这种张力也促进了希望的想象,这种希望的情境可以使我们回溯到恩格斯曾热情洋溢地赞颂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恩格斯认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1971: 361)可能这种巨人的诱惑远不如“大学”的诱惑充实,但是我们确实是历史的当事人,我们的确是事件的参与者,我们不能不把“回顾历史、检审当下、走向未来”作为我们的生存方式,时代的坐标也规定了我们生存的象限。这个时候,知识不是确切的明知的,而是生存在生命之中的那种刻骨的感受和行动的激情冲动。于是就大胆起来,在这种激情的冲动中学习、体察、畅想和写作。这个结果或许不是知识,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散乱的胡思、想象的碎片、观点的拼接。因此这只是郭氏回应,一种把深度埋藏在浅层的回应,一种通过远离现实来接近现实的回应。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社会根的设想是大胆的,但是却非妄为的。第一,它并不跟随西方的知识模式。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在作祟,而是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绵延状况。中国的问题场域和实践样式,完全可以有一种独立的知识形式加以呈现,在这部著作的下部可能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实现西方理论的脱域,不管是一种假设,还是一种想象,都可以成为一种知识建构的方式。从西方理论中获得想象,如果能够脱域,就在一定程度上获取历史与普遍交往的理性光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东西甚至最近最新的东西都能产生亮光,因此我看的更多的是中文版,我看的更多的是中文著作。我要做

的不是跟在这些著作后面,不是从世界发展的那个抽象的一个个片段中无限放大。我要做的是从那些不完整的体系中,从那些知识表述的断章取义中,从那种社会关系的脱域过程中,获得社会根思想的无穷尽的想象力。我要做的是:形成一种知识想象。为此,我做得有时还比较夸张,比如把专有词汇用汉语拼音表达,比如尽量不去对一个人的思想做系统考察,比如直接参考最近或最新的外文文献等。因为我知道,我必须汉化;因为我知道,我不能陷入;因为我知道,即便再过很多年,他们也不能提出和深化研究这种社会根理论。如果说这些做法含有胆大妄为的意义,我只能说这是一种自信的力量在左右着这种夸张性的知识想象。第二,并不跟风。社会根理论必须有根,这个根就是不能漂浮。但是如果整日跟风,那只能在世上漂。如果理论仅仅跟风,只满足于事实与权贵话语的诠释,只醉心于知识者自我实现的光鲜富有;如果学术只醉心于象牙塔中的寻章摘句,只满足于脱离实际的高蹈论列,并不能独立为一种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2008)留给读者的作者体验,留给读者的知识反思,留给读者的行动参考才是一种知识体系的能效。保持独立性是理论具有知识资格的条件。跟随时代的脚步而不是盲目跟随时代的风向,才可能保持这种知识的自主性。

胆大而非妄为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这部书写成之前,很少张扬或者声张。这倒不是为了所谓的保密,而是基于所在的这个社会的特点,这样的追问或者由这个追问演化的某种行动可能会挫败我那种膨胀的或者是扎根的野心:那么多的大家都没有提出或者很少提出所谓什么理论或(和)大家都在世上漂,你太不自量力了吧!所以,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我在做什么。如果说这是一种理想的话,我希望在漂浮的状态下沉默坚守。但是同时也带来问题,即无法向更多的人学习和讨论,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保守性。我希望下部的写作能够有所改变。我知道:同大师对话(包括读书)、向世人学习,不仅仅是理论建构的事情,也是生活的态度和个人扎根的表现。

三、去框而思：一种发问的模式

本书出版后会有成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对此我有如下想法,与有问

题的读者一起讨论。

无论做出什么问题的发问,无论发问形式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它们都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发问,而这些知识都是已经给定了要发问的问题以及形式。如果不能使已有的知识剥落或者粉碎后重构,任何形式的发问都不能说明什么,也会造成意义的缺失。沿袭过去的思维,实际就是进入一种知识建构社会的陷阱中,这个陷阱就使得知识者成为井中之人。这个说法,不是反知识主义的言辞,而是揭去知识身上的那些被人覆盖的掩饰真实的面纱而做出的善意提醒。所以,我一点都不反对发问,只是希望所提出的问题是真的而非假的,是实在的而非虚化的。应该明白:我们的问题往往也在知识的干预下变成一种虚在,问题指涉的对象也成为被知识所建构的问题。

这时就需要提出一个知识行动论的概念:知识框。要做出有益的发问,必须打碎以往的知识框,放弃固化的思维,否则就会被以往框住。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否就是一种反基础主义的观点。这是扎根还是拔根?回归真实,不被知识所异化,不被知识框所框住,尽管是很困难的,但是却留下了扎根之思的印象。打破知识框的发问,不是不要知识的发问。我们需要的是不被知识框住的一种发问,这种发问就是知识行动论的一种表现。因此这是一种扎根。问题是能否修炼到不被知识所禁锢不被知识框框住。这种修炼肯定就是一种扎根。

知识何以会成为框,进而禁锢知识行动者的思维?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看,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甚至科学知识也与社会情境有关,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所揭示的核心内容。科学知识被常识化不仅改变了学者的发问方式而且影响着日常生活世界里普通行动者的思路与行动。当行动者被异常建构或者科学化建构(强构)的时候,知识转化为知识框,从而转变为思维禁锢。固化思维以及这种思维情境下的行动包括了固化的发问方式。

去框而思,知识、行动、知识行动等关联问题才可以获得根性启发。知识与行动并非已有知识框下的那种裂解和认知。但是到底是什么,无法也无须言说,只能留给读者去框而思。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卷内容留下的很多问题可能在以后的写作中得到解决。一个双赢的建议就是:思而问之,而非看而问之,可能是一个好的方法。或者更直接说就是:读完了思定了,再说再问。

四、社会根理论的写作方式与理解

这部书的写作方式可以看作附带感受的札记体。这部书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札记的方法,边记边议、边叙边述,所以好像没有观点,似乎没有结论。或者,观点的凸显和明说,仿佛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有观点,如果这些观点可以串成体系,那么这些东西都隐含在那些冗长的记述之中了。我的观点如果像幽灵一样在时刻动摇,肯定会吓到读者的;如果我的观点是固定的,像固化的知识框,肯定会害人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写法,这种学术这种做法肯定就是一种失败情绪的结果。

这样的一种写作方法和思路的安排,使作者的叙说更加顺畅和简便,但也使读者的阅读更加困难。那么多的往往会招引瞌睡虫蜂拥的文字能给读者留下什么呢?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说是:肯定留下成堆的无意义的意义。现实些,留下更多的是思考(更坦率说是读书而非翻书——我恨死了让我快速翻看的书及其作者),因为在明处没有结论甚至意犹未尽,至少在这三卷的内容中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在暗处读者能够读出什么来,这全在读者的阅读方式。接着出现的问题是:既然这个所谓的理论宣称具有本体论关怀或者说以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通知识行动者为出发点和归宿地,那么这种写作方式就使得这种宣称成为虚伪。应该说,札记写法使得知识的层次化更为明显,而读者的知识层次事实上同作者的这种内涵的知识层次是重叠或者相互镶嵌的。这样所谓的精英阅读理解不仅可能完全误读,而且可能再次被重构。二次建构的特点非常有可能蒸发作者,消失了作者的重构可能会冲垮作者的知识框,从而进入社会知识框,这就彰显了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对作者来说,这种社会化的知识框可能是被误读过的,进而可能是虚假的。这个时候,只要读者达到可以领悟与体会作者的知识框才有可能去伪存真,获得思考性问题,并在日常生活中体察。走进作者的能力不仅仅是作者的写作期待,也是社会知识化水平的评价方式。这就是说,作者留下了一系列的知识结构缺口,或者说是结构性知识落差,从而产生新知。这也是作者期待的知识进化方式。

更明确的说法或者问题是:扎根的写法湮没了作者。社会根和社会根理

论在哪里呢?如果一定回答,我只能说就在你阅读的过程里和阅读后的思考中。“社会根理论”的出场可以作出许多可能是致命性的评价: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冗长乏味、精简嫁接、拼凑组合等。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因此知识层次性也就决定了评价的层界性。毁而建之,破而立之,是建构主义者的思维,所以期待摧毁一种知识框而建构另一种知识框,这是知识演进的要求。

由于写法的给定,这部书名是“社会根理论”,实际上读者不要被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蒙蔽。因为这只是札记性思考,说它是东拼西凑,一点也不为过。知识并没有体系化,观点并没有知识化,思考并没有理论化。能够给读者的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开了一扇窗。能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能提供一点反思的材料,能体现一丝想象的努力,就足够了。

五、社会根理论与知识行动论何以关联

笔者最基本的想法是:通过知识行动使社会扎根,进而催生新社会。实际上,通过知识行动而扎根不仅针对个人而且针对社会。社会根理论,说到底解决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针对当下当然是现代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尤其是知识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社会何以可能”是社会理论中的核心问题或者最为基础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解答出现了不同类型或者不同学派的社会理论。所以,社会根理论所涉及的问题并不新鲜,但是使用“社会根”这个概念或者视角来说明和观察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倒是显得比较新鲜。作者自以为是的新意是否可以形成一种新的知识框另当别论,但是依然是涉及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问题。为社会奠基就是社会扎根的内容。

“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当下社会转型——并非仅指中国,而是指涉全球化的情境——也就必然转换为“现代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现代社会何以可能”问题的任何理解都必须同知识相关,都必然同知识行动相关。社会的知识化是社会何以可能的基本命题,在伯格和卢克曼那里被以社会化的形式加以处理,很是巧妙地解决了社会建构的问题。社会知识化伴随着知识社会化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定型化为知识社会的形态。这个时候,“现代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无论伴随何种类型的知识演进,比如以“现代性”问题来表达,也就自然

转换为“知识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根理论”并非仅仅解决“知识社会何以可能”的全部问题，同时亦并非仅仅解决“知识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但是要强调的是这个理论以“知识社会何以可能”为其关键问题加以思考。前现代性问题在知识上并非是一劳永逸的，现代性（甚至包括前现代性）自始至终地同社会知识化契合在一起，甚至成为现代性的根基性内容。所以，社会根系很长，社会根域很广，但事实上的“本体论”关怀同知识的当下性注定以解决“知识化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为某种标志。问题接踵而来，知识社会的真实性何以确定？在这里无法做出详细的说明和给出所有的证据。知识社会尽管内含了时代所赋予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是这种社会类型——权且作为一种社会类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其真实性显得无以质疑。这个时候，有几个特点或者现象可以透露出这种真实性：社会建构作为一种知识化的建构越来越明显，“社会实体的知识建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命题，而是成为一种实在本身——一种广泛存在的实在。知识（进而知识行动）成为社会进化动力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进入社会的机体之中。类似这样的描述是无穷尽的，同时本身也成为社会根理论的组成内容。但是最为核心的说明是：“知识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是“社会根理论”或者“知识行动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或者根性问题。当然，这个说明似乎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知识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涉及社会根基问题，所以思考“知识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所得出的理论也就可以成为“社会根理论”。而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是“知识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必然同知识行动（实践）问题的解决内在联系在一起，所以一定程度上“知识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可以转换为“知识行动论”的问题。很明显，知识社会同知识有关，但是这种关联的机制就是知识行动。还要说明的是：由于作者把知识行动论定位于社会哲学（哲学）和社会学理论之间的一种知识形态，故而，尽管知识行动与知识实践有大量重合，但是还是优先选用“知识行动”这个概念加以应用。首先，知识行动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类型如同理性行动、沟通行动等行动类型一样（哈贝马斯以“沟通或者交往行动”为对象或者出发点而形成了一套社会理论，这是 20 世纪重要的知识遗产）。其次，作为一种不同于其他任何类型行动的特殊社会行动，知识行动对个人和社会具有根性意义。这里的特殊性也就在于这种类型的行动无论是单个人的还是互动的行动都是一种超越性的覆盖性的社会行动，任何一种社会行动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知识行动。知识社会的真实性

实际同知识行动的广泛性与二者之间的嵌入程度强相关。高度普遍化的知识行动是社会知识化的必要条件,知识社会必须用知识行动来奠基,知识社会必须以知识行动为动力,知识社会必须以知识行动者为主体。知识行动同知识社会相关,而知识社会何以可能是社会根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社会根理论也就天然地同知识行动论契合一致。

六、社会理论中心转移到中国的可能性

社会理论中心的转移是一种知识运动的事实,这种转移可能无法不涉及科学中心或者社会发展中心的转移问题。关于后者有更多的理论和说法。我想说的是:由于中国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大变革是一种更加复合性的和超越性的,更加强烈需要更多社会知识加以说明和解释。因此存在着社会理论的知识中心转移到这的可能性。

社会理论在欧洲兴起是同欧洲的率先发展一致的,欧洲作为社会理论的中心不仅同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关而且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关。在欧洲开启的社会学研究成为这种社会理论的核心知识,我们看到这个知识中心发生的作用。马克思改变了整个世界,而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家包括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韦伯、帕累托、齐美尔^①等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好景不

① 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生于德国柏林,从宗教信仰上来说,他是个基督徒,而从民族归属来说,他却是个西班牙裔犹太人,后面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他尽管才华横溢,成绩斐然,但在学术生涯中只获得了一种边缘性的位置。在柏林大学,他要求晋升的愿望屡次受挫。万般无奈之下,1914年他离开柏林大学,就任德法交界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教授,但那儿的学术也是一片凋敝景象。1918年9月郁郁不得志的齐美尔永别人世。虽然齐美尔作为社会学家的地位总有争议,但他对社会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此外,他同样以哲学家或心理学家著称。他中期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货币哲学》与《社会学》。他是“形式社会学”的创立者,形式社会学的目标就是对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形式进行分类,而不是实例分析。他对社会的剖析着力于个体日常的感性经验(比如时尚、都市生活等),以对众多支离破碎的生活片段的追问阐发社会学,走出了一条个性鲜明的研究道路。齐美尔的许多研究思路,和百年后学界所倡导的反对宏大叙事(所谓宏大叙事,通俗地说,就是动辄拿自然、历史、社会、理性、形而上这些概念来说事)、注重感官经验、综合多学科视角的主张不谋而合——这或许是百年后他重新受到重视的原因。而当时,他的思想被驳斥为“时髦、肤浅”,只能在临死前的日记中感慨自己的学问后继无人,不日将被世人遗忘。